

YISHU DE JIAOYU GONGYONG YISHU DE JIAOYU GONG

艺术的教育功用

周帆

潜移默化之谜

主体审美心理体验
艺术的教育功用

贵州人民出版社



黔新登字01号

责任编辑 张良君

技术设计 杨林栩

封面设计 曹琼德

书 名：艺术的教育功用

著 者：周 帆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址邮编：贵阳市延安中路九号（550001）

经 销：贵州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 本：850×1168MM 1/32 6.125印张 147千字 2插页

版 次：1993年5月第1版 199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1000册

书 号：ISBN 7-221-03004-9/G·1564

定 价：3.5元

本书受
贵州省1991年度出版基金资助

序

周帆的《艺术的教育功用》一书即将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我为此感到由衷的高兴。1985年至1987年间，周帆在北师大跟随我攻读文艺学硕士学位。在学习期间，他既刻苦、努力，又善于思考问题。艺术教育功用问题是他长期思考的问题之一，后来他的硕士论文《艺术教育功用理论的回顾与瞻望》，就是《艺术的教育功用》的第一章，在答辩中他的论文获得了答辩委员会一致的肯定与称赞，不但认为他的论文选题有意义，而且认为他对过去艺术教育功用理论的清理别具一格，十分有新意。他不是采用传统的按时代、国别、人物的划分法进行清理，而是在考察古今中外的浩瀚而庞杂的材料的基础上，将艺术教育功用理论按角度加以清理。他把以往的理论划分为三类：一、社会政治、伦理的角度；二、哲学—美学的角度；三、个体感性生命的角度。在这个深刻而充满真知灼见的总清理的基础上，他提出了用新的心理学的角度来阐释艺术教育功用的新的理论假设，并提出了一些很值得重视的新观点。

这次读完他的《艺术的教育功用》一书，我感到周帆经过了几年的潜心研究之后，对艺术教育功用问题，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都作了更加深入、更加精当的考察与探讨。就以此课题研究的对象而言，传统的研究只是把艺术本身及其对可能产生的影响作为研究对象。周帆看到，这种传统的研究对象，没有深入到活生生的人的心灵世界中去，因此只能停留在一般的现象描述中，不可能追寻其本质。周帆的著作，为了更深刻地揭示艺术教育功

用之谜，把正在欣赏着艺术的活生生的人，作为考察和研究对象。考察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流连于艺术世界中时的具体生动的心理状态，从而也就真正揭示了艺术对人的生理和心理的功用。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运用了心理学的方法切入对象，为艺术教育功用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拓宽了研究的思路，这是很有意义的。

周帆这本书有不少独创性的见解。如他对艺术引发人的情感状态的分析，对审美情感状态与一般情感状态的区别，对艺术对人的生理和心理的作用与影响的论述，对艺术的潜移默化的原因和过程的揭示等，都富于新意，敢发前人之未发，而且论证深刻有力，有较强的说服力，这都是值得称道的。

周帆此书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艺术教育就是审美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审美教育，包括艺术教育，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今天，尤其显得重要。世界上最可宝贵的东西就是人，就是人自身的完善。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理想说到底就是人的理想。马克思曾经这样给共产主义下定义：“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彻底的、自觉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了全面地占有人的本质，使人的身与心、肉体与精神、感性与理性得到和谐的发展，我们不但要搞好经济建设，满足人的物质需要，而且还要搞好精神建设，使人的精神也得到高度的发展。这就是说，当社会呼唤经济建设的时候，文化艺术则要呼唤人的建设。贫穷、落后当然谈不到人的全面发展，但富裕、先进也不等于人就会自然地得到全面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为了防止人的残缺化、片面化，为了使人的本性的全面的复归，为了使成为全面的人、丰富的人，审美教育其中也包括艺术教育的巨大意义，就

突现出来了。周帆这部书，对艺术教育功用作了深入的探讨，其旨趣就在于发出了对人的呼唤。我多么希望人们能听到这种热切的呼唤。

童庆炳

1992年12月

目 录

序.....	童庆柄
第一章 艺术教育功用理论的回顾与展望.....	(1)
第一节 社会政治、伦理角度的褒与贬.....	(3)
第二节 哲学, 美学角度的超脱与批判.....	(15)
第三节 个体感性生命角度的批判、显现与呼唤.....	(28)
第四节 理论的回顾与新角度的展望.....	(40)
艺术教育功用的理论浩如烟海, 本章未按国别、时代、人物分类, 而是巧妙地依所属研究角度的不同, 对历史上有关的理论进行了一个总清理, 给运用新的心理学角度奠定了基础。	
第二章 情感状态: 心理学角度的切入点.....	(50)
第一节 艺术教育功用研究的对象.....	(50)
第二节 情感状态形成的心理学根据.....	(57)
第三节 两种情感状态的区别.....	(84)
此章是全书的支点。它着重论证了艺术教育功用研究的对象, 不应该是艺术, 而是接受艺术的人。要了解艺术究竟有何功用, 应从艺术引发的人的特殊情感状态入手, 探讨这特殊的情感状态特殊在何处, 它对人的生理和心理功能有何影响。	
第三章 超越: 人的本质属性的肯定.....	(72)
第一节 生理机制的调谐与发展.....	(76)
第二节 心理压抑的张扬与解放.....	(87)
第三节 生命发展的组织与制导.....	(99)
本章根据审美情感状态具有使人快乐、组织性、趋于美三个特点, 论述了处在此状态中人的生理和心理变化, 从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出发, 提出了艺术的超越作用就在它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 不断	

地肯定了人的本质属性，使人逐渐地按美的规律建造人自身。

第四章 适应：情感反应模式的调整与建构……………(112)

第一节 情感模式与“心灵”……………(114)

第二节 艺术中的情感模式……………(124)

第三节 潜移默化之谜……………(132)

第四节 情感的宣泄与补偿……………(139)

本章根据现代心理学的观点，提出在人的自我之中不仅存在着皮亚杰所谓的认知结构，也存在着一个情感反应结构。它是人的心灵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人的动机和情感活动的策源地，潜在地左右着人一生的行为。情感模式是由情感表现形式（喜怒哀惧）与内在评价标准构成。由于艺术里情感模式的评价标准与现实情感模式的评价标准不同，因而当欣赏者为艺术情感所掌握时，就可能不知不觉地用艺术里的情感模式的评价标准去替换或变异现实里的评价标准，从而触及到人的心灵。因此，艺术的功用就在它能在一定程度上变异作为人本性的心灵，从而使人更好地适应社会。

第五章 艺术教育与现代中国人……………(152)

第一节 审美游戏与个体心理发展……………(152)

第二节 艺术循环与群体心理变异……………(165)

第三节 艺术教育现状与现代中国人……………(177)

此章在上述揭示的艺术功用的基础上，提出了如何实施艺术教育这一具现实意义的问题。从一般游戏和审美游戏的区别，指出了早期审美教育对人格形成的重大影响。在揭示我国目前艺术教育的落后状况之后，发出了要提高国民素质、必须充分重视艺术教育的呼吁。

第一章 艺术教育功用理论 的回顾与展望

本章是对历史上艺术教育功用理论的一个清理。

清理一种理论，头一个棘手的问题便是寻找一个与对象相适应的切入方法。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庞杂无比、浩如烟海的历史文库。讨论艺术教育功用的著述，在西方可上溯到柏拉图，在中国可推至孔子。数千年来，哲人们无不有所涉猎，各家之言，可谓林林总总，洋洋大观。再说，文艺与人类共生存，同发展，彼此息息相关，因而除了哲人们的探讨，历代以来，更有数不清的文人骚客热情的颂赞与呼吁，政治家冷静的剖析与断言，道德家激烈的倡导与针砭。这样，本来就很复杂的理论愈发显得扑朔迷离，千头万绪。事实上，许多研究者一头扎进去，就陷入了世俗功利褒贬之争的旋涡之中，难以自拔和超越。可以说，数千年来，这个问题的研究处于“理还乱”的状态。那么，如何才能拨开这层层迷障，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提纲挈领地从整体上把握这一理论系统呢？

现代物理学心理学打破了传统僵硬、简化的“主体—客体”的认知模式，带来了思维方式的革命，也给我们的研究以启示。以洛克、牛顿为代表的古典实在观曾认为，物体本身具有自己的全部性质，这些性质不依赖于任何观测而具有确定的意义。人的认识不过是客体在意识中与任何认识条件无关的模写。比如

一张桌子的长短，形状和质量就是桌子本身固有的属性，它们决不会因你看不看它、站着看还是跑着看而改变。相对论否定了这种看法，认为桌子的长短形状和质量确实同站着看还是跑着看有关，强调了观察角度在认识中的作用。在现代物理实在观看来，

“实在”本身只是潜在可能性的总和，由可能变为现实，潜在变为物理实在，有赖于观察的类型和方式。可见，主体的观察角度是认识中的十分重要的因素。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曾引用了黑格尔的一段话：“在探索的认识中，方法也就是工具，是主观方面的某个手段，主观方面通过这个手段和客体发生关系。”^①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也揭示了，主体的认知模式是在婴幼儿期与外界联系的活动过程中，由某种潜能逐步“发生”而成的，人的任何认识总有主观认知模式参与。这些论断告诉我们，理论形态不过是人们从某种观察角度出发对事实或现象进行归纳或演绎的结果。因而倘若抓住原有研究角度这一线索，就能将异态纷陈的理论形态予以整理和归类。所以本文将采用按其原研究角度划分理论形态的方法。“解铃还须系铃人”，这熟语与其说强调的是人，不如说强调的是系铃人的思路。只要循其思路，就可以顺绳解结，于混乱中见规律。

本章所以不采用一般按时代、国别或作家的划分法，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观察角度的更替意味着新理论的诞生；另一方面还在于，原有理论并不因新理论的产生而消失。也并不是有了新理论，原有理论就是错误的。角度的转换只是透视点不同，它们各自建基于不同的社会需要，并不能互相取代。好比初等数学与高等数学，现代物理学与牛顿力学，各有其存在的理由。不同角度理论往往处于并存的状态，这也是造成理论复杂的原因之一。采用按研究角度划分的方法，就可在重叠中见层次。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36页。

由于中国有一个漫长的封建社会和复杂的近代，研究角度的转换不太清晰，因此我们把西方的理论作为主要对象。综观历史上有理论，尽管其错综复杂，千缠百绕，但若按其原研究角度，大致可分三种：一、社会政治、伦理的角度；二、哲学—美学的角度；三、个体感性生命的角度。

清理自然不是目的，目的在通过清理对各派理论进行评述，在对其内在线索和发展轨迹的勾勒与描述基础上，显现出当代探索艺术教育功用的新的途径和趋向。

第一节 社会政治、伦理角度的褒与贬

1. 人类探索艺术教育功用的历史远较一般想象的早得多。从各民族史前的神话和史诗留下的痕迹看，它几乎伊始于文艺观念的产生。不过其具体的观点，已无法考证了。到了有文献记载时，展示给我们的便是关于它褒与贬的毫不妥协、相互攻讦的争辩。从此，这种争辩贯穿了整个文明史。其间既有柏拉图对艺术不遗余力的攻击，奥古斯丁发自内心的恐惧的哀叹，卢梭的惊世骇俗之言；也有亚里士多德的睿智远瞩，卜加丘竭尽全力的颂扬，车尔尼雪夫斯基充满热情的肯定。从现象上看，双方彼此截然对立，水火不容，但骨子里却有着共同一致的东西。这就是，双方都是从社会政治、伦理角度来探讨艺术教育功用的。比如，柏拉图就把此问题置于如何建立理想国的背景中来讨论。亚里士多德干脆就把“音乐论”作为其《政治学》中的一章。

所谓社会政治、伦理角度，就是从社会政治、伦理观念的需要出发，并以其作为评价的标准，透过艺术与社会的联系来界定艺术功用的方法。文化史告诉我们，人类首先是从实用功利的眼光来看待世界的，因此在探索艺术教育功用时，首先采用社会政治、伦理的角度并不足为奇。需要解释一下的是这一角度何以会

导致争论，争论又何以会历久而不衰。

如果我们把所有有关艺术教育功用的理论看作一个结构系统，那么社会政治、伦理角度所形成的理论则是其中一个子系统。皮亚杰指出：“结构本身是不属于可以观察到的（事实）的范围的。”^①因而我们不能只是在可观察到的经验事实的范围内进行描述，而要为经验事实的表层现象找出一个深层结构，这样，才能对表层现象作出演绎性的解释。这深层结构何在呢？就在研究角度与对象之间的切合点上。因为，这切合点不但是二者自身众多属性那部分相通之处，也是决定二者之间以何种方式发生联系的关键。这种联系也就是形成该角度理论性质、特点的原因所在。照理，功用的探讨似乎应从对象的本质谈起，可是我们看到，且不说每一角度对艺术的本质都有自己的见解，而且在同一研究角度内，本质与功用的解释常常也是互为因果（这正是每个角度理论的封闭性原因所在）。若采用此法，研究势必陷入悖论循环，在原有水平上打转。深层结构的探讨，不但可以揭示各角度理论对艺术不同看法的原因及对功用的看法，还能展示各角度理论的最大视角范围。

社会政治、伦理观念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强烈的现实性。这种现实性构成了这一研究角度的最大特点：直接的功利性。它，就是这一角度理论的内在动力源泉。它是一股强大的世俗力量，在深层潜在地支配、制导着这一角度理论的发展。正是它，紧紧地抓住了艺术与现实生活相联系的特点，并在这一点上与之相切合。既然“实在”本身只是潜在可能性的总和，由可能变为现实所依赖的是观察的类型和方式，那么由这种直接功利性去看，艺术与现实的联系不过是使它具有教与乐两种属性罢了。这样，浑然一体的艺术便被分成了两半。从功利着眼，并未把艺术视作单纯

①皮亚杰：《结构主义》，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98页。

的“教”，似乎很客观，实质上这不过表现了功利与艺术难以完全切合的矛盾。为了解决这种矛盾，让艺术作为一个整体与之切合，“乐”的属性自然被降到从属或服务的地位，艺术便被视作了可以实现某种功利的“手段”或“工具”。这种功利与手段的关系便是这一研究角度的深层结构。这深层结构是这一角度理论系统的自我调节性所在。它把艺术的功用牢牢地置于是否适应社会政治、伦理需要的背景上加以评判，也给自己设定了一个不可自我超越——封闭的理论界限。

2. 功利与手段的深层结构决定了这一研究角度的特点，它不是从艺术与人的相互关系去探求艺术的功用，而是从社会政治、伦理需要决定取舍。既然艺术被视作手段，手段者，人皆可用。于是艺术失去了自己的目的，而随意被赋予其它的性质。现代心理学认识论告诉我们，人们对世界的看法是受其本身的观察角度所制约的，同一观察角度又受其内容规定性的制约。因而当人们从社会政治、伦理角度去探讨艺术的教育功用时，社会政治、伦理观念本身的对立性、多样性、变易性诸特点便制导着直接功利性趋于不同的指向，由此而形成了这一角度理论鲜明的特征，褒与贬的争论。

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例。二者同是从维护奴隶制的稳定和国家安全出发，得出的结论却不同。柏氏代表的是奴隶主贵族的利益，着眼的是造就治国者和卫国者。在他看来，人的灵魂由理智、意志和情欲三部分组成。这三部分就相当于国家的三个等级：统治者、战士和劳动者。情欲是人性中无理性的，亦即低劣的部分。要造就前两类人物，它应当受到理性的节制。然而理性不易摹仿，情欲却“最便于摹仿”。诗人和艺术家为了博取名利又往往利用人性的弱点，满足人们的情欲要求，“逢迎人性中的低劣部分”，灌溉并滋养它们。而一旦情感泛滥虽贤者也不免于腐败。再说诗是“摹仿的摹仿”，与真理隔着三层，毫无价值可言，因而

他把诗人排斥在他所设计的政治修明的国家之外。甚至对大诗人荷马，他也毫不宽贷。因为荷马笔下的神有时比人还要低级。如天神宙斯，不仅是一个淫人妻女的魔头，同时又是一个惧内的庸夫。这种描写起到了伤风败俗的作用。与柏氏不同，亚氏代表的是平民的利益，他着眼的是陶冶自由民的自由灵魂。因而他得出了与柏氏不同的结论。他指出诗是以个别表现一般，所以不但能反映真实，而且比历史更具普遍性，悲剧的功用就在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情感得到净化。

在中国对艺术教育功用持肯定态度的是孔子。据传他本人喜爱音乐，能弹琴鼓瑟，击磬高歌。有“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①之说。他比较完整地总结了艺术的积极功用：“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②可见孔子也是从维护社会稳定出发来评价艺术的。同样是从社会政治、伦理角度出发，墨子却明确提出了“非乐”的主张。原因在他认为嗜爱声色伎乐不仅要浪费人力物力，而且还消磨人的志气，使统治者怠于政，人民怠于耕。

争论双方，无论中外，皆是把艺术当作维护社会秩序的手段，并从社会政治、伦理的功利来评价其功用的，即均受制于功利与手段这深层结构。而导致争论的原因，不过是由于具体观点的不同。可是，后人却仅看到表层现象的“异”，未看到深层的“同”，对于这种褒与贬的争论，妄自充当法官判定谁是谁非，而使用的标准不过是另一套社会政治、伦理观念。这样实际造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政治、伦理观念的碰撞。在同一研究角度内形成了“同性”的循环。随政治的变迁，古人功过也变，翻来覆去，

① 《论语·述而》。

② 《论语·阳货》。

非但未平息争端，反使其绵延不已。远的不说，解放以来评述艺术教育功用的方式就基本如此，其结果便是，入乎其内就陷入了难解的纠纷之中。其实，只要不囿于这个角度的范围，超脱一点便可看到：所谓褒贬之争不过是这一角度直接功利特点的外化和表现。对立双方，并无绝对的褒贬，有的只是绝对的功利。比如柏拉图，尽管他竭力攻击诗，但并非绝对排斥艺术，对音乐他就另有一番看法：“节奏与乐调有最强烈的力量浸入心灵深处，如果教育方式适合，它们就会拿美来浸润，使他也就因此而美化。”^①无独有偶，肯定艺术功用的亚里士多德对笛声却持有异议。他认为“笛声仅能激越精神而不能表现道德品质”，^②所以不适宜用于教育，因为它“无补于心灵的操修”。^③倘我们撇开这些褒贬之词，透过双方激烈争论的表象，便可看到，在直接功利动机后面，双方实际有着共同一致的认识。这就是在深层结构支配下，都从现象上看到了艺术具有移人心，从而影响社会秩序的作用。只是由于直接功利的影响，还未把它在理论上抽象概括出来，而寓于褒贬之词中了。由此可见功利对理智的影响。这里受影响的不是个别的人，而是整个人类的正常理性。因为这种功利源于现实社会需要、阶级的需要，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只要有国家存在，就会有这种功利，就会有社会政治、伦理的研究角度，即使在理论上扫清了障碍，也还会有没完没了的褒贬之争。可见，直接功利性是使这一角度理论持续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至今也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因。

3. 每种理论都有其发生、发展和成熟的阶段。社会政治、伦理这一角度的理论持续的时间虽长，成熟却较早。如前所述，都是从社会政治、伦理角度出发，甚至都是从维护和巩固奴隶制出

①柏拉图：《理想国》，朱光潜译，摘自《文艺对话集》，第63页。

②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427页。

③同①，第428页。

发，得出的结论却截然不同，这使古代的哲人们感到困惑。时代、历史的局限使他们无法超越自身的观察角度；阶级的局限又使他们看不到自己出发点的差异，即政治、伦理观念内容上的不同，因而只好把目光盯在艺术这个对象身上，并试图以改造艺术的办法来统一这一矛盾。这时候诞生了两个伟大的理论家：贺拉斯和荀子。

本来，一个学说明显的对立，自相矛盾，是难以构成一个理论体系，更无法维持其长久生命力的。正是贺拉斯与荀子以高度的概括力，摆脱了长期以来关于艺术功用絮絮不休的争论，使之自成体系，具有较大的弹性和适应性。而使这一角度理论得以建立的核心便是贺拉斯的“寓教于乐”说和荀子的“美善相乐”论。前者见于《诗艺》著名的诗句：“如果是一出毫无益处的戏剧，长老的‘百人连’就会把它驱下舞台；如果这出戏毫无趣味，高傲的青年骑士便会掉头不顾。寓教于乐，既劝喻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①后者出于荀子的《乐论》篇：“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②这二论的提出，标志着这一角度理论的成熟。

当然，一个理论的成熟决不是偶然的。如果说贺拉斯是总结和综合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成就，那荀子则集了孔老庄墨之大成，二者各自自成一体。其成熟的标志在于，大大超越了前人单方面的论述，在更高层次上概括了艺术的教育功用。这个超越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不再纠缠于艺术具体有什么好作用、坏作用，而是在其众多的属性中抽象出了“教”与“乐”这最根本的

^① 亚里士多德、贺拉斯，《诗学·诗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54页。

^② 见《诸子集成》《荀子·乐论》篇。有的版本作“莫善于乐”，引者认为《诸子集成》的解释更为有理。

两点，客观上概括了阶级社会中艺术的性质和特点。对此韦勒克·沃伦在其编著的《文学理论》中曾予以高度的肯定：“整个美学史几乎可以概括为一个辩证法，其中正题和反题就是贺拉斯所说的‘甜美’和‘有用’，即诗是甜美而有用的”。^①二、明确了教的功用。用在“改造人的心灵”，即可以培养或改换人们的思想感情、伦理观念，从而在心理上建设一个符合社会需要的人。如荀子所说：“夫声乐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②，通过对个体的影响，可以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本来这一思想并不新奇，前人早已涉及，但没有这样系统、概括。三、更进一步，还揭示了教与乐之间的关系，即利用乐来达到教育的目的。这样既把握了艺术的内在本质特点，又顾及了其外在的功能。贺拉斯就明确指出：“诗人的目的在给人教益或乐趣，或写出予人乐趣，又有教益的诗句，……寓教于乐的诗人能博得人人拥护，既予读者以快感，又有教训可汲取。”^③荀子则要求美与善要与乐（lè）结合起来，在乐中得到美善的感化。以上三点，可说是社会政治、伦理角度与艺术经过长期相互碰撞，最终找到功利与手段这一立足点，相互切合起来的理论表现。

一个理论是否强有力，在于它概括现实和满足现实需要的程度。所谓概括，指理论模式是否抽象到功能与形式的高度而不受其具体内容的羁绊；所谓满足，指能否为现实所接受。这也是检验一个理论是否成熟的标志。由于“寓教于乐”与“美善相乐”客观地概括了阶级社会中艺术所处的地位和性质，所以，它们的高度概括性满足了从其产生到迄今不同形态阶级社会的需要。人

①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9页。

②《荀子·乐论》。

③亚里士多德、贺拉斯：《诗学·诗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9页。